

国家认同与共有观念

——对社会建构主义核心概念的反思

宋 伟

内容提要 本文对社会建构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国家认同与共有观念——进行了反思。论文探讨了国家认同如何形成,共有观念具有何种独立性及其所发挥的效用。作者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家对社会建构主义在这两个方面的批评,提出在存在许多因素影响国家认同、国家利益和共有观念的情况下,理论家可提出不同的认同理论、利益理论和共有观念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论文对国家认同和共有观念的独立性提出质疑,认为对它们的过分强调使建构主义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体系理论倾向,国家的能动性不断消减,因而关于意识对生产力的影响这样更有意义的问题的探索就无从谈起了。

关键词 建构主义 国家认同 共有观念 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学界的新秀斯蒂法诺·古奇尼(Stefano Guzzini)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虽然他熟悉的领域是现实主义,但在《重构国际

《国际政治科学》2008/4(总第16期),第103—119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一文开篇,他对社会建构主义这种理论在短期内所取得学术地位发出感叹:“好一段成功的历史!建构主义在十年前还湮没无闻,现在却已成为了这一学科既有核心理论的公认竞争者。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随处可见一样,“……的社会建构”出现在我们各类著作、论文和学生作业的扉页之上。对常规建构主义跻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列的这类评论并不鲜见。随着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 将建构主义从一种注重过程的方法变成具有“国际政治文化”核心概念的理论,一些学者甚至预言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有望取得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的学术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著名学者如约翰·拉格 (John Ruggie)、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把自己的著述或者思想列入建构主义的阵营,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不可回避的现象。

尽管社会建构主义拥有了越来越多满怀热情的拥护者,不断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声明他们的观点,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回应。理性主义学者在论述时会或多或少地对建构主义做出反击,但他们的批评仍然较为零散。现实主义者更醉心于“攻守平衡”以及是否应该在国际结构之外纳入更多国内政治因素的争论。因此,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和相互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在温和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之间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论文专门总结过理性主义学者对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批评。在国内,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00, p. 147.

Hayward E. Alker, “On Learning from Wend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 141; also see Steve Smith, “Wendt’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 151.

这方面较好的总结可以参见: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1—200. 不过,即使是对于引起广泛关注的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论争的热潮也只出现在 2004 年之前。2006 年出版的《建构主义与国际关系:温特及其批评》一书对此做了总结。参见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2006 年到 2008 年的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orld Politics* 和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这几本最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刊物中,基本看不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争鸣的文章,甚至大多数建构主义论文的参考文献也停留在 2003 年之前。

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回顾和总结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特别是理性主义者)围绕温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国家认同”和“共有观念”,所做出的反思和批判。论文围绕两个方面展开:(1)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具体来说,包括认同如何形成、它包括哪些内容;(2)有关共有观念的问题,具体来说,共有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它如何发生改变等。在回顾国际关系学者已有批判的同时,本文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玛亚·齐菲斯(Maja Zehfuss)是近年来研究和批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她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国家认同的形成。温特把认同定义为相对稳定的、对自身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预期,因而是“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卡赞斯坦也认为,建构主义所说的国家认同,“指涉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认同)的形象。”可以发现,卡赞斯坦对认同的界定比温特更为明晰:一方面认同是对自身独特性(是“自我认同”)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种认同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展现出来的。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展现的呢?这就涉及到国家认同的形成问题。

由于温特是一位明确的体系理论者,因此他宣称《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并不考察认同的形成过程。不过由于认同在建构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认同的互动构成作为政治文化的共有观念,认同决定利益并进而决定国家行为,温特还是对角色认同或者说“角色身份”的形成进行了解释。在解释过程中,他借用了社会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把行为体彼此认知的过程分成“发出信号—理解—做出回应”三个步骤,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相遇的假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参见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4.

设。如果行为体 A 最初发出善意的信号,得到行为体 B 善意的回应,并进一步给予善意的答复,那么双方就会形成“朋友”的角色认同;反之,则会形成互为“敌人”的角色认同。可以看出,温特的理论着眼于共有认同或者说共有观念,而且这种认同的内容相对简单:仅包括了敌我关系,而敌我关系又是通过互动形成的,与别的因素没有多大关系。

对于另外两种更独立于社会进程的认同——团体认同和类属认同,他基本没有给予建构主义的解释。这两种认同主要是基于行为体本身的自组织性,如作为鸡、牛的物质特征(团体认同)和作为民主国家的政治特征(类属认同)。对此,两位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塞得曼和达西认为,温特的分析是不彻底的,因为最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团体认同也可以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国家和民族的边界划分就是不断变化的。

当然,温特的体系理论倾向并不能代表社会建构主义论述的全部。在 1996 年出版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中,一些带有社会学倾向的学者研究了国家认同的不同来源,其中包括直觉信念(如伊丽莎白·基尔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军队组织文化的研究)、传统的军事文献和政治思想(如江忆恩对中国“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研究)、国内的政治经历(托马斯·伯杰对德日国家认同差异的研究)以及宗教因素(迈克尔·巴尼特对中东国家认同变化的研究)等。这意味着,国家认同并不一定来源于国家间互动产生的相互关系认识,也可能是包含具体内容、源于国家自身独特性的国内互动所建构起来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建构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所提到的认同形成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性的。不过,似乎很难把他们所研究的许多“认同”归入团体认同、类属认同还是角色认同;很多只是国内丰富多彩的观念而已,如法国军队的组织文化或日本的和平主义倾向。毫无疑问,像日本的和平主义这种认同属于角色方面,需要得到他者的认可。可以说,现在还很难看到像温特互动认同理论这样系统化、基于国内政治分析的建构主义认同理论。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 404.

Lars-Erik Cedeman and Christopher Daase, "Endogenizing corporate identities,"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p. 138.

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一位美国学者曾批评道,“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已经分裂成为许多的流派,因此,它必须在‘理论’的基础上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具有一贯的研究纲领而不是像现在的论坛性质。”“不同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方法论甚至术语方面都存在差异,导致著作、论文和会议论文就像是巴别塔:各说各话,互不理解。”

齐菲斯对温特的认同形成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她认为,尽管温特把角色认同和文化都归为国家间互动的产物,但温特已经假设了一个先验的基本认同,即国家本身。她援引温特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的认同的论述说,“我们发现,FRG是以一个具有完整的意图、信念和需求的单一行为体的面目出现的。在进行互动之前,它知道自己是‘FRG’。它作为国家行为体的存在是独立于国际体系的,有着生存的渴望。”“这种团体认同是基于国内政治、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国家体系和外生给定的。”不难理解,温特之所以持有国家中心主义观点,是为了建立一个使互动过程变得清晰的理论,但在齐菲斯看来,温特的这种处理隐含着一个假设:进入互动的行为体是一个统一的、有着一定程度自我意识或者认同的国家。的确,温特也明确地把国家称为是“自组织”的实体。

齐菲斯考察了FRG的认同变化。她发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认同争论,不同的政治势力对历史的解读大相径庭。什么是“德国人”或者“德国”的问题,不仅发生在FRG和重要的“他者”之间,也一直发生在FRG的内部。齐菲斯指出,“部分的问题在于,温特的理论排除了作为认同承载者的国家的建构,以及解读国家认同的国内进程。这使认同变成了国家间可以谈判的某种东西。”齐菲斯提出了的问题很重要,因为国家在互动之前所具有的自身认同意识必然会影响到即便是“空洞的”角色认同。苏亚塔·帕西克(Suata Pasic)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她指出,“建构主义有关内涵的观点把政治研究简化到严格的行为科学的条件,好像行为规范是从空白的心理状态产生

Paul Hayman, "Theoretical Territor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ivision," 2006, <http://www.bisa.ac.uk/2006/pps/hayman.pdf>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and Identity: A Dangerous Liais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3, 2001, p. 321.

Ibid, p. 335.

的。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理论就会掩盖先前社会内涵较为重要的作用。”

与齐菲斯和帕西克的批判类似,另外几位评论家的理性主义批评也指向温特的国家中心主义假设。伯恩克指出,“温特认为国家主要是内部建构而成的,国际体系只具有次要的地位,这样的一种拟人化假设是有问题的。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国家不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战争大多也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另一位新加坡学者在考察了用社会建构主义解释东南亚地区政治的缺陷之后回归到理论领域,他尖锐地提出,“由于把国家作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发言人,温特这样的建构主义者使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认同和利益是变化多端的,但国家作为主要发言人的认同却是不能改变或受到严格质疑的。”“起码在两个方面,用建构主义来解释东南亚地区政治存在着问题。其一,为了避免把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者地区实体化,国家本身不得被实体化;其二,不管是把国家还是观念规范实体化,建构主义都无法再宣称它把实践摆在了国际政治的优先地位。”他们都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个体主义本体论(国家实体和认同先于体系存在)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体系文化决定国家认同和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

以上回溯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主义认同形成理论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温特建构主义认同理论批判最多,对其他建构主义的认同形成理论批判较少。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不仅针对温特式的国家认同形成理论,而且包括《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许多建构主义学者所探讨的国家认同根源。

国家认同本身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例如,当一个国家在形成“大国”认同的时候,它必然会审视自身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基础;当一个国家在形成“穆斯林国家”认同的时候,它必然根源于国内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主导地

苏亚塔·帕西克:《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拓展》,载约瑟夫·拉彼德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

Andreas Behnke, “Grand Theory in Its Age of Impossibility: Contemplations on Alexander Wend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6, No. 1, 2001, pp. 127—130.

Seng Tan, “Rescuing Constructivism from the Constructivism: A Critical Reading of Constructivist Interven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2006, p. 246.

Ibid., p. 254.

位。这些认同,都属于国内独特性的认同,受到包括天气、地理、自然资源、文化传承和偶然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对理解国际关系可能有用,也可能用处不大。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外,我们还没有看到严肃的建立某种国内因素和国家认同之间逻辑关系的因果假设。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国家的一些基本认同未必要依靠“他者”才能获得。

只有“角色认同”才需要考虑到“他者”。那么,角色认同是否真的只是由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建构的呢?毫无疑问,社会互动的进程会影响到行为体对彼此的认识,但如果行为体互动的进程本身就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呢?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欧由于技术实力、产品竞争力的拉近,在贸易往来上的争端不断增多,导致双方对彼此角色认同的变化,从不平等的保护关系向平等的合作者转变。这显然不是因为双方的商人在互动中出了什么问题。因此,同样地,角色认同的转变也会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互动的过程顺利与否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无穷多种国家认同形成的理论模式。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之所以没有太多涉及认同或者观念的因素,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本身不存在,而是它们根源于或者说取决于实力的对比。正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战争的起因在于斯巴达对于雅典实力增长的恐惧;恐惧是一种心理状态,标志着斯巴达和雅典双方角色认同的根本转变,而这根源于双方实力关系的转变。与建构主义认同解释的唯心主义倾向相比,从物质和利益出发解释认同无疑更有说服力。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也正如十九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士累利的名言所指出的,“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更指出,“利益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关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认同概念本身,有值得注意的评论。胡学雷注意到仅仅从互动和相互关系来界定认同可能引发的问题,即略去了国家本身非常丰富的认同,仅仅留下了同集体认同、共有观念相一致的高度抽象的角色认同。还有学者认为,“认同概念对于社会科学没有多大帮助。它是一个被建构的实

转引自朱炳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08页。

胡学雷:《国际社会结构是观念结构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 6期,第 4页。

体,不管在个体层次还是集体层面上。它生来就必须面对各种冲突。从定义上来说,它就必然是动态的,意味着不同阶级、种族、宗教,以及对文化独特性的需求,并且往往意味某个真实或者想象的敌人的存在。”这么看来,把认同引入国际关系可能更多地带来是混乱,而不是向共同体迈进的希望。陈玉聃的批评类似于这种观点,但他呼吁建立一种不同性质的自我认同。他考察了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二分法思想,认为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一直被视为达到自我认同的途径。因此,“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矛盾和冲突的,而不仅仅是有区别的;国家总是通过发现敌人来界定自我的边界。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认为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的国家认同可能造成了冷战后美国不断寻找敌人的倾向。所以,他呼吁建立一种从自身学习和修养来获得自我认同、自我肯定的理论。

二、共有观念的形成、独立性及其效用

如前所述,国家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主义尚未厘清的问题;相比之下,共有观念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共有观念——不管我们是称之为共同知识、规范、规则还是政治文化——是社会建构主义体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使建构主义成为理论的关键要素。围绕着共有观念的形成、独立性及其效用所展开的争论,是社会建构主义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和挑战。由于温和建构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尼古拉斯·奥鲁夫(Nicholas Onuf)和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以及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对于共有观念的形成、内涵和独立性的认识并不相同,为此,我们下面简要回顾他们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批评。

温特认为,四种因素会促进国家反复互动过程中共同知识(相同的个体认同)的形成。这四种因素分别是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或者说相似性)

Astrid Busekist, "Uses and Misuses of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Security Dialogue*, Vol. 35, No. 1, March 2004, p. 84.

陈玉聃:《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渊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6—53页。

以及自我约束。其中每一种因素都不足以单独确保形成共同知识或说集体认同,只有前面三种因素中的至少一种和自我约束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导致集体认同的形成。温特对共同知识形成动力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可能带来友谊,也可能带来更多摩擦和敌意。这种不稳定的共同知识通过内化,最终会沉淀为结构性的集体知识。不过,温特对自己理论的不足有着清醒的认识:这里的共有观念还停留在共同知识(类似的个体认同)的状态,而不是结构化的集体知识。不仅如此,他也没有涉及前面四种因素背后的根源。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提供结构变化的完整理论。在共有观念的效用方面,温特认为,只有理解了体系文化才能完整地解释国家利益。他的逻辑是,共有观念(集体认同)决定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利益,进而决定国家行为。因此,秦亚青把温特建构主义的理论逻辑总结为国际文化—国家行为。”

与温特类似,奥鲁夫、费丽莫和克拉托赫维尔都重视互动进程对于共有观念形成的作用。不过,奥鲁夫受语言哲学的影响较大,重视的是言语行为的交流以及语言规则本身的作用;费丽莫的研究涉及较多理性主义因素,但强调了个人、国际组织作为共有观念提出者和传播者的作用,以及国家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共有观念;克拉托赫维尔也认为,人们正是通过交流中的争论、说服、获取同意推动着政治规范的形成和改变。这三位学者都赞同共有观念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强调的程度不同。奥鲁夫有相当强的体系色彩,他甚至认为“规则产生了统治,而对行为体本身如何去改变已有的规则缺乏论述;费丽莫也表现出相当强的整体主义倾向,认为国际组织而不是国家构成国际社会变化的动因;克拉托赫维尔承认规范(共有观念)和国家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但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框架语焉不详。如前所述,温特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整体主义色彩,虽然他试图把微观层次的互动(共同知识)和宏观层次(集体知识)贯通起来的任务没有完成。在共有观念的效用方面,既然这些社会建构主义学者都持有较强的主体间主义的立场、坚持共有观念的独立性,那么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强调共有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费丽莫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可以说是其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30—452页。

同上书,第454页。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中的典型代表,而温特则从理论上考察了三种不同的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下国家行为呈现出来的显著不同。

一般来说,理性主义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对共有观念具有独立性的观点都会进行强烈的质疑。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学者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反而找到了共同点。约翰·米尔斯海默尖锐地批判了包括社会建构主义在内的所有批判理论。他雄辩地指出,“批判理论坚持认为,国家行为随着话语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对这种观点可以提出一个很明显、具有关键重要性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某些话语成为主流,而另外一些则丧失了市场?”“尽管无政府状态是我们自己造就的,但是当批判理论家试图解释现实主义为什么将失去霸权地位的时候,他们也把客观的因素作为这种变化的终极原因。这样看来,话语并不是决定性的,而只不过是客观世界变化的反映而已。”另外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也做出过类似的评论。在接受《国际关系》杂志访谈时,他指出,“观念总是会不断地冒出来,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某种权力做支撑,观念就会逐渐消亡。”“很难想象没有得到某种物质力量的支持,一种观念能够推动社会,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既然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因素的基础性作用,那么他们对观念作用的看法自然不会太高。米尔斯海默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相信“国家永远不能确定他者的意图。”而且,意图总是瞬息万变:今天可能是友善,明天就翻脸无情。”也就是说,不管是共有观念还是个体认知,都是靠不住的。吉尔平明确指出,对他而言,“像经济组织或军事技术的变化这些物质要素比那些本质上属于主观构造的要素更重要。他还形象地指出,“有确定的现实在那儿,如

尼古拉斯·奥鲁夫:《建构主义:应用指南》,载于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鲁夫、保罗·科维特:《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尼古拉斯·奥努弗:《建构主义的哲学渊源探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惠耕田:《限制权力,为规范开辟空间:克氏规范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

John J. Mearsheimer,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42—43.

吉尔平:《温与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62页。

John J. Mearsheimer,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 10.

果你不加考虑就硬往上面撞,那么现实的撞击就会是结结实实的。”

美国学者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也对社会建构主义依赖共有观念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行为体利用对方思维上的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公众场合,他们表现出某种形象,扮演某种角色,常常和他们真实的信仰没有多大关系;利益才是幕后的真实原因。”温特试图假设说自我和他者都在努力表达他们的真实观点,对对方所扮演的角色相信不疑,从而形成某种共有观念,这样的抽象显然是过分简单化的。而未来的意图是更难以预测的,受到国内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判断未来的意图。科普兰的这一批评可以说击中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要害。科普兰甚至嘲讽说,社会建构主义是迷信过去的理论,而现实主义才是向前看的。

科普兰还对温特的共有观念(文化)本身的定义提出了质疑。温特指出,共有观念的内化存在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是受到强制威胁,第二等级是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当行为体只要对共同的行为规范分享基本共识的时候,那么它们就分享一种文化。科普兰认为,在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时候,国家的“共有观念”还根本不能算是文化,也根本不是内化,仅仅是知道这些规则而已。根据温特的定义,为了赢得时间整军备战的国家如果加入了集体安全体系也是在“分享”一种康德文化。科普兰评论道,“安全困境是真实和普遍存在的,无法通过更好的话语实践加以解决,因此必须面对。”另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则提出,“如果文化实践的确塑造了经验和期望,那么我们就需要界定它们,并使它们能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具有解释力。”这样的评论对奥鲁夫和克拉托赫维尔的建构主义观念来说更为恰当,因为这两位学者更加注重言语行

吉尔平:《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第67页。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Autumn 2000) p. 202

ibid, pp. 203—205.

ibid, p. 212

Antje Wiener, “Making Normative Meaning Accountab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35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oda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21—22 October 2006, <http://www.qub.ac.uk/polproj/renew/pdfs/Millennium%202006%20Wiener.pdf>

为在沟通过程中的作用。

还有一种批评观点认为,建构主义者为了理论化他们的思想,迈向了沃尔兹式的体系论,这反过来导致了同样的维持现状偏见。“许多建构主义者以对秩序的假设入手,这造成了建构主义理论中的‘维持现状偏见。他们假设了一个文化秩序,在其中社会角色和规范维持了既定的均衡。最终以外部因素来解释体系的‘选择,如温特注意到了外部的压力,经济和环境威胁。”

建构主义理论家克拉托赫维尔对温特的共有观念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弱式物质主义”颇为不满。他指出,一方面“文化”这个概念太大,不适合用来描述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温特所谈到的文化转变理论使得他的体系观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变成了物质因素、观念和利益的大杂烩。此外,同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泰德·霍普夫(Ted Hopf)也对共有观念或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诸多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点。即使在洛克文化的世界中,也可能出现高层次的合作水平;在同一时期的同一世界中,可能存在多种国际政治文化。即使在冷战时期,围绕着核裁军出现了大量的合作,以及对欧洲现状的最终承认。再次,不同的单个国家之间也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文化,甚至同样两个国家在不同领域也会出现不同的合作水平(文化)。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南非和安哥拉在军事上相互敌对,但在世界钻石供应方面却是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自由主义者也对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基欧汉批评社会建构主义因果关系不清楚、没有说明观念如何发挥作用。建构主义者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承认,“建构主义者可能把国际机制和制度作为理解全球政治的主要方法;他们也可能同那些强调国内政治和国内制度作为理解大国政治的

Stacie Goddard and Daniel Nexon, "Paradigm Lost? Reassessing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Vol 11, No 1, pp. 33—34.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3.

Ted Hopf,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to Social Constructivism", April 2005, <http://psweb.sbs.ohio-state.edu/intranet/rip/hopf.pdf>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 1988), pp. 379—396;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心变量的自由主义者为其；许多社会建构主义还会欣然加入各种批判理论的人类解放计划。”在此，我想指出社会建构主义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一个误解。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批评新现实主义不能解释具体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当然，罗伯特·基欧汉也承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没有关于国家利益的理论，因而必须求助于国内因素。基欧汉甚至认为，吉尔平、克拉斯纳和沃尔兹等人“认识到，不能仅仅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定义利益，更不能从大国的外在地位推导出其利益。”这样一些论述必定会使许多现实主义者感到迷惑：既然在无政府状态下，实力分配是国际体系中交易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它为什么就不能解释大国的利益和行为呢？事实上，正如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一样，也会有大量因素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形成，因此我们也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的国家利益理论。因此，借助于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变量，研究者理应提出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尽管沃尔兹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就不能做到。

事实上，新现实主义在研究国家利益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这里，我只举出三个代表性的成果：（1）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战争理论说明了霸权制度对于霸权国家的重要性；维护某种秩序或者创造对自己更有利的秩序成为了大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甚至为此爆发系统性的战争；（2）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解释了体系压力对国家行为的强大影响。为了安全，国家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壮大自己的实力、遏制其他地区出现地区性霸主；（3）秦亚青在他的博士论文《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建立了一个霸权护持模式，依据霸权国的实力地位确定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再如，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相对实力的变化导致了苏联的新思维和冷战的结束，这是最

Thomas Risse, "Social Constructivism Meets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Approaches and Controvers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http://webfu-berlin.de/atasp/texte/globalization-constructivism.pdf>

罗伯特·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载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见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他对许多社会建构主义者宣称“冷战结束削弱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感到非常奇怪、不能理解。

思考:物质与观念的关系

如前所述,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认同和共有观念是国际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效用。因此,它是一种所谓的“理念主义。”为何国际体系的本质是理念优先的呢?这最终还是回到了一个本体论的问题。“社会事实”是社会建构主义发展出其核心概念的起点,也是其向现实主义发起挑战最为有力的武器。那么,什么是社会事实呢?温特借用罗伊·巴斯卡的理论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社会类别在四个方面不同于自然类别:1)社会类别依赖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工业革命;2)社会类别的存在依赖于行为体的信念;3)社会类别依赖于实践;4)社会类别不仅依赖于内在的结构,也依赖于外在的相互关系。我想(除了后现代主义者)大多数社会建构主义者会接受这种对社会事实的定义。在温特看来,社会类型和“纯粹的”自然物质不同,但仍然具有客观实在性。他对这种客观实在性有着深刻的洞察,“说到底,社会类别的理论所指涉的必须是自然类别,包括可以用因果指涉理论解释的人的身体和人的实在行为。不承认客观自然的建构主义是过于激进的建构主义。”“社会类别在不同程度上根植于物质,是自组织的现象,具有独立于希望认知它们的人的思维/话语而存在的内在力量和特性。”因此,社会类别仍然具有客观实在性,只不过它受到人类信念和实践的影响比较明显罢了。这种对社会事实的看法非常重要,是社会建构主义试图成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基础。温特称之为“弱式物质主义。”

这样一种立论起点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问题:(1)存在着“纯粹的”物质基础吗?(2)社会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纯粹的物质基础”?(3)如果物质因素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种区分的意义在哪里?第二个问题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p. 5—4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86—89页。

同上书,第90、95页。

和第三个问题是建构主义理论本身所遇到的重大难题,前面已经做了论述。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建构主义强调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差异的做法,笔者认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方面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社会建构主义要深刻得多。列宁总结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新成就和人类实践的新经验,给哲学物质范畴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他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都是客观实在的。这是一种彻底的唯物论,而无须像社会建构主义一样,寻找论证“社会事实”既客观存在又具有特殊性(人类行为实践而成)这样的一条中间道路。”

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既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同时在意识和实践的作用方面更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可改造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或者说观念是由实践决定的,“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由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者又是彻底的能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自然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中,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向客体渗透和转化,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列宁更是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既明确地强调物质世界对观念的基础性作用,也承认观念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辩证唯物主义所指的客观世界和物质实践强调的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统一。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改造社会世界、社

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费·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总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页。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229页。

会事实,同样可以改造自然世界、“自然事实”。概括各种实践形式,可将其分为三种最基本的形式。(1)物质生产实践。这是人改造自然世界的活动,是各种实践活动的基础。(2)处理和调整社会关系(社会事实)的实践。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关系是否合理会影响生产的效率和分配是否公平、正义。(3)科学实验和精神生产活动。

因此,如果要强调观念的能动性,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更彻底、更统一的。社会建构主义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社会事实,其实丧失了一个很大的解释空间,也就是人的思想创造对技术发明的重大影响。特别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几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整个世界在自然面貌和社会面貌方面的巨大变革。科技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则是决定世界政治经济面貌的最终因素。

回顾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霸权的时代,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崛起的德国成为英国的最大威胁,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使得美国霸权进入了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巩固了其实力地位。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世界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确,新的思想和实践可能改变社会世界的面貌,但这只是意识或者说观念作用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这些创新所带来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变革,乃是我们社会发展、国际体系演变的根本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意识能动性对于整个国际体系发展的作用,可能比简单的局限于用彼此的相互认识来解释国家间关系要深刻得多。

建构主义把大量精力放在意识的独立性(或者“意识赋予物质以意义”)和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领域内,而没有认真考虑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事实上,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的种种制度规则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的改变都依赖于物质基础的变化,而不是仅仅通过想象和话语实践就可以做到。如果社会建构主义能够系统地说明或者叙述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如何改变物质基础,从而导致国际政治的本质变革,那么这才是真正触及了世界政治研究的深层命题。由于过分强调意识的独立性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导致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本质上仍然是静态的,从而呈现出很强的整体主义和唯心主义色

彩。如果我们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全面审视观念、意识对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我们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某种意义上的普遍理论。这样的理论既不会像社会建构主义学者一样容易倒向唯心主义,也不会像一些极端的现实主义学者那样看不到人类的伟大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学者所列举的很多强调意识赋予物质以意义的例子也值得认真推敲。例如,温特认为,英国拥有 500 枚核武器美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朝鲜有 5 枚核武器美国就会坐立不安。事实上,在朝鲜目前的技术、军事准备状态下,拥有 5 枚核武器根本威胁不到美国。再说,英国拥有 500 枚核武器不算什么,但如果是 5000 枚,50000 枚呢?也许,社会建构主义只有情势不那么紧迫、不那么需要“现实主义”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决定性效用。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肯尼思·沃尔兹对建构主义所作的带有讽刺性的评论,“建构主义根本不能算作一种理论。如果所谓的理论根本没有解释力,那它就不能称之为理论。很难说建构主义能够解释什么,相反,它所提供的只是对整个世界看似充满希望的见解。人与国家的利己主义的诉求转而被利他主义的动力所替代。它们行为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谋求私利,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这种想法很好,然而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会始终如一的按照利他主义的想法行事。除非某个国家能确信其他国家会在自己面临困境伸出援手,否则它必须尽可能地先照顾好自己。建构主义理论主要在一些基本不必担心自己安全的国家和人群里有些声望,例如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西欧,或者那些在大学里高枕无忧地生活的人们。”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73.

Kenneth N. Waltz, "Neorealism: 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 *Politics & Society*, Vol XV, Spring 2004, p. 5.

作者简介

聂宏毅 199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获军事战略学硕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总参谋部办公厅工作。2008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反制高技术主战兵器招法》(合编,2001年)。

电子邮箱: nhy04@mails.tsinghua.edu.cn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85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分别获技术物理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9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工作,1999年8月至2000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最新著作为《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2006年)

电子邮箱: libin@mail.tsinghua.edu.cn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研究。

电子邮箱: benyin109@163.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2年在黑龙江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分析》(2008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6年)、《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年)、《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

电子邮箱: yanxt@mail.tsinghua.edu.cn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生。2006年作为交换生在香港大学学习。

电子信箱: hyx05.tsinghua@gmail.com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3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获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2005年)。

电子信箱: pkusongwei@yahoo.com.cn

左希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2007年在南开大学获国际政治学士学位。

电子邮箱: zuoxiying@gmail.com